

巫仁恕、康豹、林美莉主編，《從城市看中國的現代性》

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0。xv+401頁。

盧漢超*

本書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在2007年6月召開的「從城市看中國的現代性」國際學術討論會的論文集。全書除導論外，共收十四篇論文，大致可分為日常生活、物質文明、娛樂文化、宗教活動和民間團體等五個題目，各題目之間有交叉，而各篇論文在理論的探求上都試圖與現代性聯結，從而使全書貫串著「從城市史的發展來看中國的多元現代性」這一主題，並「嘗試突破現代化或西化的框架，擴大視野與議題到其他的面向」（引本書巫仁恕〈導論〉，頁ii）。不少課題都是學術界較少或從未有人涉及的。下面試就各篇的重點、相互間的聯繫和全書在理論上的概要，作一簡略的介紹和點評。

賴惠敏的〈乾嘉時代北京的洋貨與旗人日常生活〉、鄭揚文的〈清代洋貨的流通與城市洋拼嵌(mosaic)的出現〉、連玲玲的〈女性消費與消費女性：以近代上海百貨公司為中心〉以日常生活中的消費文化為中心，討論西方物質文明在中國傳播、被中國中上層社會乃至大眾接受的過程。賴惠敏從十八世紀英國進口的洋貨中，選擇了毛織品和玻璃兩個項目作為切入點，討論乾嘉時代北京的洋貨如何滲入和改變旗人的生活。作者用了大量中英檔案資料和北京的碑刻史料、戲曲資料等，詳細分析洋貨的來源、流通及其對北京宮廷、寺廟以及一般旗人日常生活的影響。毛織品中的西洋呢毯絨氈，不僅用於宮廷，更普及

* 美國喬治亞理工學院艾倫人文學院教授

於寺廟，如寺廟的壁衣、地毯、帳篷和喇嘛的衣服等。西洋呢毯的引進也成為北京民眾的家居用品。玻璃除了用於建築和室內裝潢外，更用於日常器皿如碗盤、花瓶、鼻煙壺和喜慶設備如花轎等。作者指出，洋貨的流通和普及打破了階層的藩籬，乾嘉時代有越來越多的旗人可以享受本來只有上層才能享受的舶來品。洋貨進入中國後，經上層消費，既有模仿，又有創新。在風氣和消費品味上，宮廷影響平民，北京影響外省。

鄭揚文嘗試用明朝的「大商業時代」、清朝的「中國世紀」、鴉片戰爭後的「帝國時代」、和二十世紀的「冷戰時代」這四波浪潮，來形容「明代以來外來商品的中國化過程及其異同」。收在本集子裏的這篇論文用竹枝詞結合清人筆記小說為材料，主要討論十九世紀中葉前的清代外來商品，如機織布、啤酒、洋房、自行車、鐘錶等本土化的過程。作者指出外來的物質文化，需要在某種程度上符合並能提高本土現有的生活方式，才能由一時的風行轉化為長期的需求，其商品才會有市場。也就是說，由外洋帶進來的物質生活的現代性需要有一定的本土文化的支撐才能移植成功。由此引發的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是中國社會經濟如何造就或者不能造就這種需求。物質文化顯然與物質條件即經濟基礎有關。如計時，遲至二十世紀中，中國大多數農村居民尚常用「一頓飯的功夫」、「一袋煙的工夫」、「看看太陽有一竹竿高了」等等方法計時，而報曉雞則是最常用的催床鬧鐘。他們對機制鐘錶是有此需求而無此能力，還是基本上無此需求？本文試圖拼嵌或解讀的 mosaic 是否僅適用於城市，與鄉村無關，還是其中有個城鄉漸進的過程？這些都是可以討論的。

關於起源於歐洲的百貨公司在近代亞洲的興起有陳錦江、程愷禮(Kerrie L. MacPherson)等人的研究，但連玲玲對近代上海百貨公司研究從婦女史的角度切入，十分有新意。本文的詳盡程度，也為大多數關於東亞百貨公司的論文所不及。¹作者所關心的是消費的性別化，女性消費的特點，以及女性如何在現

¹ 參閱 Kerrie L. MacPherson, ed., *Asian Department Stores*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8)各章。

代百貨公司中因為其性別而被「消費」，即作者所稱的「消費女性」。作者不時將上海的百貨公司和女性消費與西方作橫向比較，雖未能深入，卻增加了文章的廣度和可讀性。「消費女性」這一概念相當有意思。女性店員被用來吸引男性顧客，其中貌美者更成為上海小報炒作的資料，等於為商店作了義務廣告。由此百貨公司在僱傭女性職員時，常以貌取人。一方面，上海百貨公司的興起、中產階級女性在那裏的消費、以及為爭取這個消費群體所作的種種努力，包括發行《永安月刊》這類以女性讀者為對象的綜合雜誌，說明都市中上層階級女性在現代消費社會中的地位。另一方面，百貨公司有意無意地以美貌女店員作號召，用「消費女性」來吸引男性消費，說明百貨公司在物質上的「現代性」尚未上升到性別平等這一現代性的精神層面上。

與日常生活的消費文化有相當關聯的是人們的娛樂追求。廣而言之，巫仁恕的〈從遊觀到旅遊：16至20世紀初蘇州旅遊活動與空間的變遷〉、柯必德(Peter J. Carroll)的〈20世紀初期蘇州的花柳區〉、張寧的〈「賭心思」：民國時期上海的回力球賽〉三文都是試圖從人們「尋歡作樂」的活動中看現代性。蘇杭被稱為人間天堂，向來是旅遊勝地，學界對傳統的蘇州旅遊業，尤其是二十世紀初以前的情況，卻缺乏研究，巫仁恕的文章填補了這一空白。從傳統士大夫的中秋夜登虎丘賞月，遠涉太湖冬看臘梅、夏觀荷花，到一般鄉人進香東嶽、被稱為「草鞋香」的大眾旅遊，在在都說明在現代旅遊業興起以前，跨城鄉和階級的多種形式的旅遊早已是蘇州人生活的一部份。太湖風景區原因離蘇州城較遠，乏人問津，但清中葉後交通改善，更加上文人題詠、士林官府相偕勒石鐫刻於景點，使一些原本無籍籍之名的景點聲名大噪，頗類似於當今大陸的「開發旅遊景點」。又如明清時代婦女纏腳，不利於行，但她們卻早就是旅遊大軍中的一支勁旅。其中朝山進香就是旅遊的一種形式，蘇州本地有「借佛遊春」之說。此外，作者更從城市空間和社會空間兩方面分析。簡言之，蘇州旅遊空間的變遷，反映了城市格局的變化，而傳統士大夫和近現代知識分子在旅遊方面往往起了引領潮流、開拓風氣的作用。明清時代社會菁英常涉足的地

方，到了二十世紀已成古跡，成為旅遊業的賣點，作者更由此指出現代旅遊是一種「消費傳統」的行為。

如果說遊山玩水這類娛樂一般不涉及道德倫理問題，那麼嫖和賭則有明顯的道德界限。蘇州既是傳統的旅遊勝地，也是歷史上文人騷士尋花問柳的所在。柯必德的文章著重談南京政府時期蘇州的禁娼運動。該運動從南京政府建立伊始的 1928-1929 年間起，陸陸續續地進行五、六年，但大多是虛應故事，禁而不止；到了抗戰前夕，不僅官娼恢復，蘇州城內私娼更是比比皆是。這是一個古老的故事，反映的是道德與金錢、公共衛生與私人生活之間的矛盾，而政府的介入往往不敵金錢和私欲，民國時期蘇州的禁娼失敗只是一個不幸的個例。不過，在二十世紀的中國，禁娼運動中有了人權、女性地位、民族主義的呼聲，儘管這些呼聲仍遠不敵商業利益的冰冷考慮，卻賦予了這個古老故事前所未有的新內容，是為「現代性」。柯文似乎有點借古喻今的意思，作者在文末稱蘇州的清末民初建築和街景保留遠勝內地其他城市，而「婦女的血汗與奮鬥，以及那些鋪陳性產業的男性慾望及同性社交行為的特權，在現今環境中，即使無實景可見，仍舊具體可及。」（頁 169）

張寧關於民國時期上海的回力球賽一文則從賭博業看現代性。從西洋傳來的回力球比賽，以其賽場聲光化電的效應，異國賽術的新異快速，以及賭博的刺激性，常被引為上海華洋雜處、據時代前列的一個典型例子。回力球賽在孤島時期（從太平洋戰爭爆發至抗戰結束）的風靡，尤其被引為國難時期，上海「馬照跑、舞照跳」的生動寫照。張文是迄今為止學界對上海回力球賽最詳盡的研究。從回力球在 1930 年初的引入，到孤島時期的盛極一時，以及上海法租界現已消失的原中央運動場，都有生動的描述。作者慧眼獨具，將回力球的流行與傳統士大夫從事牌戲的心態相比，指出回力球之所以能在滬上迷倒眾生，尤其是使知識分子也樂在其中，是因為賭回力球被認為不是單純的賭運氣，而是「賭心思」，需要一點知識、一番計算，與「引車賣漿者流」的賭博不同，因此使小資產階級的文化人大為著迷。從中也可見一種外來的文化形

式，往往需要有一定的本土條件，才能被大眾所消化接受，這與上述鄭揚文指出外來的物質文化，需要本土消費文化的包容力，才能由一時的風行轉化為長期的需求，是一致的。不過回力球雖然風靡一時，名聲並不好，十賭九輸的上海市民用回力球英文名「Hai Alai」或「Jai Alai」的諧音，稱之為「害阿拉」（「阿拉」者，滬語「我」或「我們」也）。在滬地的賭博史上，也只能算曇花一現的事物。

在尋求塵世快樂的同時，注重來世的宗教也在西學東漸的時代努力調節甚或重新定位。劉迅的〈修煉與救國：民初上海道教內丹、城市信眾的修行、印刷文化與團體〉、范純武的〈飛鸞、修真與辦善：鄭觀應與上海的宗教世界〉和康豹(Paul Katz)〈一個著名上海商人與慈善家的宗教生活：王一亭〉三篇文章各就一個人物為中心，就這一問題展開討論，可以同讀。劉迅的文章以有「科學神仙家」之譽的近代道教學者陳撻寧(1880-1969)為中心，縷述陳撻寧在道教式微的二十世紀，試圖重塑道家傳統的種種努力。陳撻寧及其友人同志，通過在上海辦雜誌、興學會、刻道經等方式，不但意在發揚光大道家思想，且將其重新詮釋和理解，以適應中國千年不遇的變局。所謂仙學的概念，就是要在傳統道學上注入「科學」的新理解，在丹道傳統中挖掘科學起源，使之成為足以抗衡全盤西化、增加中國人民族自信性的東西。

同樣地，范純武從宗教史的理路來看近代著名學者和實業家鄭觀應(1842-1922)。學界對鄭觀應的研究不少，但從宗教的角度切入則不多。鄭氏終身求道修真，晚年稱自己「待鶴求道已五十年」；他不但鑽研南北丹經數十種、長期從事道經的整理和刊刻，並且身體力行，從道家思想出發參與慈善活動。范文在鄭觀應的道家思想和實踐方面深入跟蹤，對兩者都有詳細的描述。讀者可以觀察到在燈紅酒綠、紙醉金迷的上海，道家的善堂、鸞堂、靈魂學等等，似乎與一些史家筆下該城處處是西化的咖啡館漫遊者的形象大相徑庭，卻是實實在在地存在著。

康豹的文章專注另一位海上著名人物王一亭。上海出生的王一亭

(1867-1938)，曾遊歷日本，在商界從學徒幹起，做到日本大阪商船株式會社買辦、上海商會會長；又投身辛亥革命，與宋教仁為密友；在社會上更是致力慈善活動多年。王氏生活的豐富多彩，用作者的話來說，是「過著這晚與愛因斯坦共進晚餐，次夜又接受濟公『鸞言』的生活」。王一亭處在一個極度變化的社會，卻並非消極地應付或適應，而是積極地創新，建立自己的組織，在變亂中為宗教（佛教）找到新的定位。

上述這三位人物均曾深入接觸過外來文化，也在不同程度上接受西方新思想，但他們又是中國傳統道學的堅決捍衛者和實踐家。現代城市，特別是上海這樣一個華洋雜處、有著「國中之國」的租界的大城市，為他們提供一個思想和活動的平臺。上海作為近代中國最現代化的城市的表徵之一就是多元性。中國最傳統的事物往往能在這個最西化的城市找到一個舒適的落腳點，並得以與外來的文化融會交通；有時也有衝撞，但在衝撞中卻常能綻發出新的光彩。

城市提供平臺的另一個方面是社會組織，特別是為保護行業和群體的利益而自發的民間團體。王笛的〈民國時期同業組織與地方政府關係：以成都市茶社商業同業公會為例〉一文顯示了民間團體功用的多樣性。顧名思義，同業公會的主要作用是協調行業內部的各種事務，並就同行的各種共同利益對外（主要是地方政府）溝通和交涉。從西方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的角度講，同業公會應是公民自我管理、自我保護的組織，用以抵制國家對社會的過度介入。民國時期成都的茶社同業公會有此作用，例如同業公會制定每碗茶的價格，既保護行業之共同利益，也避免殺價內鬥。同業公會的這類功用與傳統的行會例如「茶業幫」同。但同業公會在與政府的關係上頗微妙。同業公會既須保護同業權益，代表同業與政府集體抗爭（最普通的是稅率問題），又需要依恃政府的權力去規範同行，保持它在整個茶社業內的權威。同業公會甚至利用政府的力量來限制茶館數量，排除異己，減少競爭。

與成都茶業公會這種長期的又有相當歷史可循的會社不同，上海的房客聯合會是二十世紀才有，而且往往曇花一現。多年前我在研究上海里弄時，曾對

房客聯合會的現象作過一點關注，也有過一些評論，但終因材料的不足而未能深入，所以閱讀孫慧敏〈「房客聯合會」與 1920 年代上海的房屋減租運動〉一文有一種舊友重逢的感覺。²房客聯合起來要求減租或者抗拒加租是近代工業社會大都市常有的現象，在有關法律不齊全，或者尚付闕如的情況下，更是如此。孫文從國家與社會關係的角度考察這一現象，指出國民政府對房客聯合會的態度最能反映國家對社會組織的現實考量。雖然沒有跡象表明共產黨在上海的地下組織參與鼓動北伐時期的抗租減租運動，但中下民眾聯合起來對付有產者這種訴求，本身就與 1927 年清黨後的政治空氣不合，故不為新成立的南京政府所支持。南京政府甚至另有經濟上的考慮，即欲從上海房東們的租金收入中分一杯羹，充作北伐軍費，名曰「協餉」。作者指出房客聯合會比會館、公所、商會等更具城市性，然而在上海這樣一個以移民為主、流動性很大的通商口岸中，鄰里間除了在抗租減租上有共同利益，可以為此目的一時地組織起來外，很難形成社區認同感。值得指出的是，房客聯合會之類的組織在 1930、1940 年代還不時地出現，但未成氣候，往往遭「烏合之眾」之譏，原因也在此。

與上述兩文注重民間團體的「抗爭」不同，林美莉關於會計業和徐小群關於現代話劇的研究，注重行業的自我建設。現代會計業作為一種從西方傳入的專門知識，其興起的基本背景是現代法治社會的形成。民國創建最初十年以及國民政府定都南京後，中央政府均頻繁進行各種工商經濟立法及修法，雖政令繁複，卻是現代會計業的立足之本。林美莉的論文〈近代中國本土會計師執業空間的拓展〉以民國時期最負盛名、由潘序倫創辦的上海立信會計師事務所為例，勾勒現代會計業在民國時期的活動軌跡，特別著重立信為永安紡織公司、申新紡織公司、南洋兄弟煙草公司等數家大企業提供專業協助，擺脫舊式帳房先生的陰影，建立良好的專業形象和發揮實際功用的過程。中國本土的現代會

² Hanchao Lu, *Beyond the Neon Lights: Everyday Shanghai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pp. 20-21, 225-229.

計業從初出茅廬時遭外人嘲諷，到後來為在華外資企業如可口可樂(Coca-Cola)、德士古脫(Texacoat)承擔業務，以及從上海到重慶，歷經戰亂而不廢，說明了該業已在民國時期生根開花，成為社會（客戶）和國家（政府）共同需要的一個現代性質的行業。現代會計業雖未完全擺脫傳統帳房勉力為東家服務的形象，但這種服務不再是無條件的，而是以遵守國法民律為前提，合乎社會公義為理念。雖然社會大眾對會計業仍存疑慮，但到大陸易手之前，該業還是取得客戶和政府兩者不同程度的信任。

徐小群從話劇作為一種「城市職業與城市文化」的角度來討論這個外來劇種在民國時期興起的過程。作者認為話劇作為一種專門職業的形成，從其雛形的文明戲階段開始，經歷了從業餘演出（所謂「愛美的」，即英文 amateur）到職業化的過程，而這一過程也是該劇種參與和融入城市生活、成為城市文化一部份的進程。這一過程反映了戲劇界在現代化訴求中的種種努力，包括話劇的國語化、劇場化、商業化等。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話劇人對傳統戲劇的全盤否定，如視舊戲的鑼鼓唱工為贅餘、斥地方戲曲為病態等。這種對本土文化簡單的唾棄使話劇未能推陳出新，至少在民國時期僅成為一時流行於大城市的劇種，雖為左翼文化人士所青睞，最終未能普及話劇界所自命和宣導的現代性，成為中國戲劇現代化的成功典範，這也許是可以引以為戒的。

本書所收的最後一篇文章是岩間一弘關於大陸易手後最初三年上海民營企業職員階層的重組與群眾運動。當同時代的歐美日中產階級蓬勃發展成為城市現代性的主流，民國時期初具規模的上海白領職員階層，在 1949 年後卻必須進行「思想改造」。為了在不斷的政治運動中求生存，上海的職員階層不得不用「表演」自己來標明勞動階級屬性，試圖消融在「工人階級」的隊伍中。其中的「高級職員」則更是戰戰兢兢，努力改造，儘量避免「資方代理人」之嫌。岩間一弘的文章是對二十世紀中葉中國城市中產階級為數不多的研究之一，其對 1950 年代初共產黨政權利用群眾運動「團結」、「改造」職員有詳細的論述，是本論文集唯一一篇研究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的文章。近年來中外

學術界開始「跨越 1949 年」，關注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特別是 1950 年代史，此文是一可喜的探索。

本書有些論文顯然是作者一個較大研究項目的一部份，收入論文集，限於篇幅，史料和論點未能充分展開，讀來有些蜻蜓點水，語焉不詳；又有些論文大約因原作為英語，翻譯後在行文上偶有突兀和跳躍之感。總的來說，就選題而論，打開本書，有琳琅滿目、美不勝收之感。在理論上，這些論文所共同反映的是中國近代城市在「現代化」過程中的延續性和多元性。許多西化的事物——從洋貨到外來習俗到社會組織等等——只有在與中國「古已有之」的東西或者本土已有的「現代性」結合起來，才能獲得較好的生存發展的土壤。反之，本土的東西也往往需要經過一定程度上的洗練才能在中國「數千年未有之變局」（李鴻章語）中求得生存並推陳出新（本書有關道教的研究就是明顯的一例）。作家豐子愷曾評論道，用筷子吃西餐或者被認為是不倫不類，遭鄉下人進城之譏，卻也未嘗不是因地制宜、隨機應變之舉。³讀者通閱本書各章，一個較深的感悟是中國的現代性不必全是引進的，更不必中西對立，你消我長，而是兩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中國的一首民間散曲云：「兩個泥菩薩，一起都打碎，用水一調和，再來做兩個，我身上有你，你身上有我。」用來形容現代性中的中西結合，庶幾近之。

本書較偏重上海史的研究。從現代性、特別是市民生活現代性的角度看，將發生在南京路上的事情作為上海的當然代表是上海史研究中的一個誤區和陷阱，本書各章大多能避免之，是一可喜現象。學界對上海史的研究從半個多世紀以前視上海為瞭解近代中國的一把鑰匙(key to modern China)，到認為上海是與內地大相逕庭的「另一個中國」(another China)，到晚近對該城市方方面面的微觀研究，雖角度不同、方法各異，但對此城的近代歷史、尤其是民國時期歷史的興趣卻尚未稍減。⁴周錫瑞(Joseph Esherick)早在 1990 年代就呼籲學

³ 豐子愷，《豐子愷文集》（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1992），卷 6，頁 593。

⁴ 視上海為瞭解近代中國的一把鑰匙，最具代表性的是 Rhoads Murphey, *Shanghai: Key to Modern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3)；視上海為「另一個中國」，最具代表性的是

界應在中國城市研究方面「跨越上海」(beyond Shanghai)，但十幾年來，上海史研究熱毫無降溫的跡象。⁵本書的涵蓋範圍也反映了這一現實，全書十四篇文章中，以上海為題的論文占了九篇之多（包括徐小群、林美莉兩文；本書其他的篇章分別為北京兩篇、蘇州兩篇、成都一篇，均為中國的主要城市）。這除了晚清民國時期上海所特有的魅力、史料的豐富以及近年來上海的突飛猛進外，還是因學界一般的視角尚未切入更能反映現代性在中國深入和普及程度的中小城市。畢竟中國的大部份城市居民還是住在中小城市，如果把施堅雅模式(Skinner Model)中的城鎮居民也包括在城市範圍內，則中小城市這一概念的涵蓋範圍更大。⁶它將是學界研究「從城市看中國的現代性」的一個廣闊和必不可少的領域。

Marie-Claire Bergère, “‘The Other China’: Shanghai from 1919 to 1949,” in Christopher Howe, ed., *Shanghai, R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in an Asian Metropoli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p. 1-34.

⁵ 1996年9月周錫瑞在美國加州大學聖地牙哥校區召集一題為「跨越上海」(beyond Shanghai)的學術討論會，呼籲多作上海史以外的中國城市史研究。會議的論文後由夏威夷大學出版，見 Joseph Esherick, ed., *Remaking the Chinese City: Modernity and National Identity, 1900-1950*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9).

⁶ 據施堅雅估計，十九世紀末中國城鎮總數約達一萬一千之數，見 G. William Skinner, “Cities and the Hierarchy of Local Systems,” in G. William Skinner, ed., *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p. 287.